

# 中華民國發展史社會發展篇導論

章英華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壹、前言

十九世紀以來整個中華文明受到西方的衝擊，就如〈社會意識〉一文指出的是「面對西方文化的全面性的優越的、科學技術與典章制度挑戰」的回應。清朝政府首先艱苦面對這樣的挑戰，自同治自強運動以後，屢屢謀求抵抗列強船堅砲利之道，雖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不僅未能順利得西方文明之利，反而是節節受制於西方列強。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的發展，更彰顯清朝的積弱不振。竟致甲午戰爭之後的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於日本，展開了臺灣不同於中國大陸的發展途徑。中華民國肇建之後，從君主制轉為共和制，雖然西方的衝擊未曾稍減，但並未相應顯示著全面的社會變化，實際上只出現一些點的改變。有些改變從目前的觀點，都還見其突破性，但直到民國 30 年代末期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臺灣之前，整個中國社會仍被視如睡獅，還是個傳統社會。

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臺灣，承接了日本統治了 50 年的臺灣社會。在過去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臺灣總督府帶進了一些現代的設施與制度，但是在以農業發展為主以及殖民統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隔離政策下，雖在民國 20 年代，作為日本帝國擴張的南進基地，現代工業的雛形已於高雄展開，臺灣的整體發展仍是有限度的，直到國民政府接收之時，還是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臺灣走向現代社會的跡象，在民國 50 年代以後才趨明顯。國民政府在以臺灣為反攻大陸的基地之時，只能以臺灣為統治的對象，臺灣成為自我運作的整體社會，工業化與都市化快速展開，並逐漸增強其社會福利體制。如果以較簡化的傳統到現代的轉變觀察，雖然過去的中華民國與日本統治的臺灣都有著一些轉變，臺灣還是民國 50 年代前後才進入重要的分際點，才邁向現代化的社會。

在臺灣，人們對我們的社會各個方面仍有不少的批評，但是從全界的比較中，臺灣的經濟發展與國際競爭力都名列前茅，生活品質亦躋身前段。臺灣的經濟發展被譽為奇蹟，相應的也具現社會各個面向的鉅變，這些變遷多少都繼承了過去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殖民政府的遺業。《中華民國發展史社會發展篇》以 21 篇文章呈現中華民國百年來的社會變遷，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呈現一些基本社會制度與結構的轉型。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型為現代工業社會，首先，人口數量突破了限制，由西歐逐漸擴展至全球，持續增加，而人口結構因為出生和死亡的變化導致人口結構的鉅大轉變。其次，人類自幼到長所關聯的各類組織，都從家庭分化出來。家庭從具備生產與消費功能的單位，成為一個較為獨立的消費單位，家庭對子女的教養，很大部分交付給正式的學校教育，家庭已非最主要的工作單位，人們大部分受雇於家以外的各種工作場所，特別是各種產業組織。第三，人類所生活的環境顯現從鄉村到都市的改變，在傳統農業社會，人們的生活環境大部分是人口密度低的鄉村，地方社區有著緊密的人

際關係。雖然不乏大量人口遷徙的現象，但未改變人類聚居地絕大部分屬鄉村的狀態。隨著工業化，相應的是人類聚居地的都市化程度日增，生活環境與人際關係大異從前。第四，則是現代工業社會也產生了與傳統農業社會極其不同的社會價值，以因應更為複雜的人類社會。《社會發展篇》的第一部分，以〈人口變遷〉、〈家庭變遷〉、〈企業組織與產業發展〉、〈跨區域遷徙〉、〈都市與區域發展〉以及〈社會意識〉六篇文章呈現以上四類基本的組織和制度轉型。雖然沒有專章討論教育結構，但在第二部分的〈教育發展〉與〈流動的社會〉中都以教育體制的變遷為背景。

第二部分的論文處理的是社會階層與社會地位體系的轉型。首先，因為產業與教育結構轉變之下，不同教育程度者獲得社會地位高低不同的職業。相較於傳統農業社會。教育與職業結構日趨複雜，越是年輕的世代，教育程度越高，而個人的職業往往脫離了家庭的傳承，形成了流動的階層體制。在民國 40 年代以前的中國大陸和臺灣，已經有著現代教育與產業的發展，但是要到民國 40 年代以後的臺灣，才經歷了這種社會階層體系的快速轉型。〈教育發展、升學與社會流動〉與〈流動的社會：人力資本、社會結構與資源分配〉兩篇文章就討論這個面向的變遷特色。其次，在傳統社會人們因其特殊的類別屬性而有高低不同明顯不平等的社會地位。一般而言，最明顯是性別地位與種族群體地位的變化。一則，由男尊女卑逐漸轉型成男女平權的狀態；再則被歧視的族群，逐漸爭取到社會、政治與文化上的平等待遇。〈走出自我：民國百年婦女四部曲〉一文，呈現了中華民國歷史中婦女地位的轉變。〈族群關係的演變〉與〈原住民百年發展〉二文，特別著重在臺灣族群關係的變遷。在漢人與原住民的分化之外，隨著漢人移民的歷程，也形成了不同的族群，臺灣特殊的歷史歷程，造就了民國 40 年代以後族群關係與地位的變遷。

第三部分以社會力的崛起與轉型為對象。民國初年的中國大陸，受到民主概念的影響，曾經有著相當活潑的民間組織，但是在 20、30 年代，執政當局增強對社會的掌控，民間團體的運作受到的限制日漸增強。國民政府遷臺以後，各種傳統的社會力都受到政黨的掌控，人民結社的自由受到極大的限制，可能與政府處於對立的民間組織很難發展。同時，快速的工業化與都市化，甚至導致傳統地方組織的式微。可是，在民國 70 年代解嚴前後，社會運動與新型的民間組織形成，與在政府嚴格控制之下的大眾媒體，交互影響，都對政治的民主化都有其貢獻。在民國 70 年代解除戒嚴體制之後，民間組織與大眾媒體都有了新的發展，而地方組織更在地方派系的式微的趨勢中，有了新的運作模式。在《社會發展篇》的第三部分，以〈社會運動〉、〈民間組織〉、〈地方社會與社會發展〉以及〈媒體與社會〉四篇文章呈現社會力運作的變遷。

第四部分是以個人的日常生活與社會福祉為對象。現代社會發展除了工業化之外，還有民族國家的興起，民族國家視國民的身體與健康為國家的重要資產，人口成為可以監督管理和控制的資源。一方面，國家要求國民保持強健的體魄，當國家涉入戰爭時，國民有義務接受國家的徵召，另一方面，國家也提供公共衛

生與醫療的設施，改善國民的生活條件。另外，在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隨著經濟的成長，個人追求自身生活品質的能力亦逐漸增強，日常的消費與休閒，成為個人生活的重要成份，甚至連健康與醫療行為，都是個人消費行為的一部分，消費與休閒生活的滿足是個人生活品質的重要指標，不像傳統農業社會，娛樂只限於特定人口，往往只是節慶的活動。在生活品質提升的過程中，也不能忽略，在每個人的生命歷程中，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解決個人的健康與生活問題，必須以社會集體的力量協助個人渡過難關或增強其因應的能力，以社福體制提供國民基本社會安全保障，成為現代社會無法避免的責任。在《社會發展篇》中，我們先以〈國家技藝與身體治理〉一文敘說民國肇建以來，國家以國民為治理與動員對象的政策與措施，接著以〈公共衛生與健康〉與〈國家、醫療專業與社會互動〉二文呈現醫療政策與組織的變革，再以〈消費與日常生活〉與〈休閒、運動與觀光〉二文展現消費與休閒體制與行為的變遷，並以〈邁向全民福祉之路：從傳統濟貧到現代化社會福利制度〉為終章。